

蔣介石一瞥： 1950 年代後期日記中的觀察*

張淑雅**

摘 要

1917-1972 年的蔣介石日記，目前暫存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到 2009 年 7 月為止已經全部開放。本文擬使用 1950 年代末期的日記，來分析遷臺之後蔣介石的生活習慣、日記對蔣介石本身的用途，以及日記中顯示蔣介石作為臺灣最高領導人所關懷的重點。最後則藉由日記內容所顯示的思惟與行為模式，以及其因應困境的實例，來看蔣介石「屢敗屢戰」的生存之道。筆者認為，若對這位對臺灣發展有深厚影響的人有較深刻的認識，較可能讓歷史回歸歷史，超越前此崇蔣、抑蔣的二分對立，對蔣介石在臺施政的內涵與思惟可以有更貼近他動機的解釋。

關鍵詞：蔣中正、蔣介石日記、反攻大陸、革命、反省、修行

* 本文初稿宣讀於 2010 年 8 月 19-20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合辦的「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感謝與會者與楊翠華、余敏玲、曾麗娟、趙綺娜諸教授與兩位審查人提供的修改意見。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0 年 10 月 1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12 月 6 日。

- 一、前言
- 二、日記中顯示的生活方式
- 三、日記的功能
- 四、日記中顯示的關懷重點
- 五、屢敗屢戰的生存之道
- 六、蔣介石一瞥：代結語

一、前言

蔣介石的日記於 2004 年寄存在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以下簡稱「胡佛檔案館」), 從 2006 年開始陸續開放複製本給公眾閱覽, 到 2009 年 7 月全部日記開放完畢。雖然在此之前, 此日記的部分內容曾經用不同的形式陸續公開,¹ 但日記本身的開放, 仍將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相當重大的影響, 尤其對蔣介石本人的研究更是提供最寶貴的資料。² 有學者認為使用日記的研究已經把蔣介石從惡魔與聖人的兩極描述中, 還原成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人,³ 多數史家應該會同意這樣的觀

¹ 蔣介石的日記始於 1917 年, 終於 1972 年, 現存於胡佛檔案館者有 53 年共 63 冊的日記。有關蔣介石日記的各種版本以及寄存開放經過, 可見楊天石,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 三聯書店, 2008) 一書的前言, 頁 xiii-xvii。

² 這批日記可能的貢獻, 可參見 Fang-shang Lu and Lin Hsiao-ting, “Chiang Kai-shek's Diaries and Republican China: New Insight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5: 2 (Fall 2008), pp. 331-339. 一文的介紹。胡佛研究所的郭岱君教授也於 2009 年 11 月 29 日在東京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所舉辦的「蔣介石研究の課題と展望: 資料と課題」研討會中, 報告了日記的史料價值(報告題目:〈柳暗く花明るきところに又一村: 蔣介石日記と蔣介石研究〉), 並在 2010 年 8 月 23 日在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舉行的「蔣介石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報告〈蔣介石日記與蔣介石研究〉。日記與對蔣介石評價的轉變, 可見 Paul H. Tai and Tai-chun Kuo, “Research Notes: Chiang Kai-shek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7: 1 (April 2010), pp. 81-86.

³ 見陳永發, 〈評楊天石新著,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解讀》〉, 《傳記文學》92: 6 (2008 年 6 月), 頁 113。

察。日記開放之後，許多各國學者前往閱覽，除了研究論文與專書的出版外，還有各種專門會議或研究群聚焦在探索蔣介石個人或他所領導的近代中國的歷史。⁴ 至目前為止，中國大陸學者利用此套日記出版的研究作品最多，⁵ 2008 及 2010 年，長久研究蔣介石的中國大陸學者楊天石出版了利用此日記的兩本專書；2009 年，臺灣出版的幾本專書，以及美國學者陶涵（Jay Taylor）著作的蔣介石傳都使用了這批日記的資料。⁶ 一時間，蔣介石相關研究在全球中國近代史學界儼然成為「顯學」；雖然目前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大陸時期，但隨著後期日記的開放，相信有關蔣介石與他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在臺灣的相關研究，也將陸續展現成果。⁷

筆者於 2009 年 9 至 10 月間前往胡佛檔案館閱讀甫於當年 7 月間開放的蔣日記，因為只能用筆抄寫、時間有限，故閱覽的年份並不多，但緩慢的抄寫中可以覺察到他的筆觸因身體狀況和情緒起伏而變動，以及他對人、事的想法與改變，反而讓筆者覺得對理解蔣介石這個人（不見得是焦點事件），以及他的生活習慣、

⁴ 有關會議論文的報導可參見賴宗誠，〈近代中國國家的型塑：領導人物與領導風格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21（2008 年 5 月），頁 62-67；林美莉，〈普普蔣介石，潮流與點滴〉，《中央研究院週報》1244（2009 年 10 月），頁 4-6 的介紹。日本學界也組有「蔣介石研究會」，並舉辦多次研討會；日本學界研究概況則可參見山田辰雄，〈日本における蔣介石研究の現段階〉，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學術研討會」，2010 年 9 月 4-5 日；韓國也有學者參與蔣介石研究。

⁵ 例如 2009 年 3 月出版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之《近代史研究》，就刊載了汪朝光、王建朗、羅敏、鹿錫俊等四位學者利用蔣介石日記的研究成果；中國大陸可能是出版最多利用蔣日記作品的地區，但中國大陸學者較少討論遷臺之後的蔣介石。

⁶ 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2010）；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9）；林補法，《1949 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北：天下雜誌出版社，2009）雖然也引用了一些蔣介石日記，但並非歷史研究作品。另見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此書中文譯本為陶涵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臺北：時報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上、下冊。

⁷ 例如 2010 年 8 月 23 日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舉辦的「蔣介石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即有高純淑、陳立文、李君山等學者的論文討論遷臺後的蔣介石與其政策；同年 9 月 4-5 日北京社科院近代史所舉辦的「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學術研討會」中楊天石、段瑞聰、潘光哲等學者發表了遷臺後的相關文章；同年 12 月 2-3 日臺北中文文教基金會主辦的「《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則有林補法、王良卿、林孝庭、邵銘煌、陳紅民、陳立文、張淑雅與王正華等發表遷臺後論文；而 2010 年 10 月 30 日臺北中正紀念堂召開「蔣中正研究學術論壇：遷臺初期的蔣中正（1949-1952）」研討會，會中十篇論文更是完全聚焦在蔣介石遷臺初期的各項議題。

工作與思惟方式，甚至他治臺的政策與焦點頗有幫助。本文將從蔣在日記內所書寫的內容、日記對他個人的作用與他關懷的重點，以及日記所顯示他個人應變轉念的能力等方面，來粗略描述蔣介石這個「人」。然筆者到目前為止閱讀的日記有限，對蔣介石的背景理解也不多，故此文充其量只能提供「驚鴻一瞥」的印象，但還是期望寫出這樣一點理解，能有助於深化對其他牽涉到蔣的歷史事件相關資料的解讀。

二、日記中顯示的生活方式

蔣介石一向非常推崇《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的作者曾國藩，可能因此讓他除了自己寫日記外，也要求黃埔學生和兒子們都寫日記。⁸ 筆者所瀏覽的 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初的蔣介石日記是書寫在中央印製廠印製的日記本上，其格式（欄位）除每日記事部分外，每年開始有「年度大事表」，每週六之後接著是「上星期反省錄」、「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每月最後一日下面接著的是「上月反省錄」，每季有「本季預定工作課目」，而每年的最後則是「全年反省錄」、「雜錄」與「姓名錄」。⁹ 蔣通常下午寫上半日的行程與想法，下半日的行程則隔天寫，但會注明「昨（某日）」；有時是早上記載前一天的行程與事件（但會注明日期）；星期反省與預定工作多半是星期日或星期一書寫，上月反省則在下個月初記錄；全年反省一般是在次年檢視整年的日記後，先在其他紙上寫下大要與草稿，再抄在日記本上，多在次年年中過後才寫。日記最前面的年度大事表，與最後面的雜錄（分上下兩欄），是蔣在每日日記篇幅之外書寫想法的空間；他在這兩欄中寫完一段想法後，通常會附上書寫的日期。¹⁰ 每日記事部分大抵分為兩段，第一段在「摘要」欄下之後，寫的多是重要問題的想法；第二段則是行程紀要。雖然有

⁸ 中國文人書寫日記的習慣作用及其對蔣和其周圍人的影響，請見張淑雅，〈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僚屬與美軍〉，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上冊，頁 125-129 之討論。

⁹ 與抗戰期間的日記比較，雖然格式名稱略有變化，但內容差不多。抗戰時期日記的格式有：提要、預定、注意、記事、上星期反省錄、本星期預定工作綱目、本月反省錄、本月大事表等。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頁 xviii。

¹⁰ 有時當年的日記本不夠用，蔣會在另外的本子上書寫某些他的想法或議題，例如 1961 到 1971 年間利用另外一本 1961 年的日記本寫「歷年隨意手錄」。

人認為蔣日記內容有雷同、重覆、囉唆的「弊病」，¹¹ 但筆者認為日記並非計劃出版的文學作品，重覆或雷同的記載正好讓史家藉以理解蔣介石的生活思惟模式與關懷或困擾的焦點。

蔣介石日記給筆者的第一印象是他日常生活的規律與簡單，以及規律中所顯示的恆心。¹² 遷臺之後，蔣的個性、習氣、生活方式與大陸時期相較或許並沒有重大改變，但在臺灣的日子可能是他一生之中最安定的。當時國府雖然日日準備反攻大陸，但實際上兩岸較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只發生在兩次臺海危機（1954-1955 的九三砲戰與 1958 年的八二三砲戰）時，其他時段局勢相對穩定，他的生活也因此顯得非常規律，而 1950 年代的日記中清楚反映了這樣的規律性。或許是從軍校養成的習慣，他一般都是早睡早起（但經常失眠），每日一定做早課、午課、晚課，各課的內容包括唱詩、讀經、禱告與靜坐。¹³ 在臺北時，他早上早課、早餐、聽報、散步後，大約十點左右到總統府會客、主持會議、與重要幕僚討論公事；¹⁴ 中午回官邸午餐、午課，之後多半在官邸「記事」（即寫日記）、批閱公文、讀書／編書，¹⁵ 或批改國軍將領的讀書心得等。傍晚會有一小時左右的「車遊」，¹⁶ 晚上則餐後散步、「觀影劇」，¹⁷ 晚課後就寢。

¹¹ 朱宗震，〈讀蔣介石日記心態〉，《觀察與思考》2009: 22，頁 57。按：中國大陸的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以下同。

¹² 其實蔣介石能不間斷的寫 56 年的日記，就已經展現超人的恆心；每日維持三次定課，以及自從 1928 年五三濟南慘案之後，每日在開始「記事」前，在日記上記下「雪恥」二字，數十年不間斷，也是恆常心的展示。

¹³ 早在 1916 年信奉基督教之前，蔣就已經開始依照儒家的修身方式，每日靜坐反省修養心性；信仰基督教後，加入讀經、唱詩、禱告等靈修方法，逐漸形成他的「課」。三課內容與不同時代的差異還有待研究，但他 1949 年時自言「每日晚課，默誦孟子『養氣』章，十五年來，未嘗或間，自覺於此略有領悟。」見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收於張良任總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第一冊，頁 421。1959 年 2 月 21 日後的周反省錄中說自己每晨默誦「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之篇（《中庸》〈天命之謂性〉篇）「幾乎卅餘年」。1960 年時「每朝默誦學庸」，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60.09.24。1961 年間他在早課加入背誦朱子的〈中庸章句序〉，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61.12.31，「全年反省錄」。他抗戰與內戰時期只做早晚課，到臺灣後加上午課。遷臺之前的靜坐習慣，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頁 xviii。

¹⁴ 可惜蔣召見部屬多半未記談論的內容，有些記了談論主題，有些則只有人名沒有主題，但依據當時的局勢與召見的人，有時可以推測出談論的主題。

¹⁵ 蔣介石花蠻多時間重新編訂他認為重要的基督教或軍事參考書籍，例如《荒漠甘泉》、《教戰總則》等，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 年，「全年反省錄」。

¹⁶ 即乘車在住處附近巡視，目前的用語應該就是「兜風」；夫人在臺灣則由夫人陪同，否則由孫子或蔣經國陪同。車遊除了散心、巡視新工程等功能外，可能是與夫人或蔣經國專心討論黨國大事的時間；可惜日記中除了車遊地點外，沒有記載談話的內容。

蔣介石這樣規律的生活模式，即使在出巡到臺北以外的地區（最常去的是大溪角板山——日記中記為「角岬」、日月潭，以及高雄的西子灣）也多半維持；即便乘艦艇、飛機出巡外地，也會在艦艇飛機上做他的三課。偶然忘記，還會記上一筆，例如1959年1月22日他搭飛機飛往岡山，準備到金門巡視，日記中記到「今日在飛行時午睡，下機後審閱『危急存亡之秋』稿，故忘了午課，此為數年來之首次也。」¹⁸ 可見他做三課的恆心與生活的規律性。自己奉行之外，他還認為這樣的方式應該推廣到軍中，讓軍官們早晚有這樣「靜思與反省」的時間。¹⁹

除了生活規律外，閱讀日記者還會得到個印象：蔣這段時間的生活步調相當悠閒，幾乎像個文人雅士，絕非今日臺灣各級行政首長常常行程滿檔、到處趕場可以比擬。他每日在官邸（他稱為「蒔林」）散步賞花、不時到陽明山後公園散心（夏季則住在陽明山上）；而出巡時在日常行事散步外，每每於夜間泛舟、觀月、聽鐘（日月潭）。這樣幾近文人雅士的生活方式，除了怡情養性外，一方面可以讓他在大自然中思考重大問題，一方面也是他排遣負面情緒的方式，例如他在1958年11月11日就記下：「本日心緒沈悶，時覺被輕侮也。晚膳前後帶武孫車遊消愁。」²⁰ 雖然蔣當時貴為國府領導人，他卻不認為這樣安定舒適的生活環境是理所當然，而是懷著感恩與戒慎之心：「余嘗念我先人德澤，使不肖罪孽深重如余者，竟能享受此權位，且能百折不回，再接再厲，至今已七十三歲，在空前挫敗與恥辱重重之中，而獨得處此優裕美麗之環境生活，能不戒慎恐懼，愧為先人之後，有負其積德之難乎？更不可使先人積德，由余一人享盡也。伏惟上帝時加保佑。」²¹ 或者「總覺上帝恩賜太過，小子瑞元實不配受，未知如何報德，

¹⁷ 即看電影，一般是看國外的劇情片，偶而也會看國片，夫人不在時會看紀錄片，或因為眼睛不適而略去觀影劇。

¹⁸ 《危急存亡之秋》是蔣經國1949年的日記，於1959年8月出版，最後版本收於張良任總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頁374-502。另外的例子如他在1959年4月19日搭軍艦巡視馬祖，日記中記載「今日朝午晚各課皆在床上補行未斷也。」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9.04.19。

¹⁹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1.03。

²⁰ 八二三砲戰初期發生封鎖金門危機時，他到大溪去思索對策將近一週（9月6-11日）；砲戰結束後，他到日月潭兩週（10月25日-11月8日），主要是檢討砲戰過程、思考後續動作與反攻大陸新策略的問題，在這段期間，他有時每日下午、晚上都去遊湖，例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1.07。

²¹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9.02.07。當日是除夕，他住在高雄西子灣行館，當時名為「澄清樓」。

為上帝工作，為人民造福。」²²

以下簡述筆者認為寫日記對蔣介石本人的功用、他日記中記載的關懷重點、以及他因應「挫敗與恥辱」的生存之道。

三、日記的功能

依筆者的觀察，對蔣介石個人而言，這段期間寫日記的作用似乎可以大略歸納為四點：最簡單的功能是作為個人備忘錄與行事曆。日記中幾乎每日都記載當日行程的大要（日記多是第二天所記），這部分內容較簡略，雖然記下公務接見、會客談話、與部屬討論、主持各種會議典禮或訓話等行程，但多半沒有具體談話或討論的內容，也少有被接見者的名字（不過在雜錄欄中記有很多人與簡歷，可能是為了準備接見使用）。每週、每月或每年的「預定工作欄」，則讓他先思考、計畫與提醒自己需要處理的重要事務，這部分多為條列式。

其次的功能是作為個人發抒負面情緒的管道。蔣介石對部屬、訪客與記者的不滿或讚賞，還有對自身病痛的憂慮等感受，就他的地位（與自我要求）而言，很難隨意或公開表現。蔣介石脾氣不好眾所皆知，他似乎也是個完美主義者，很容易對人事物產生不滿與憤悶的情緒。²³ 1950年代末期的日記顯示：每當負面情緒（特別是憤怒與不耐）升起時，蔣會不斷要求自己忍耐；雖然他也會當眾或單獨對他不滿的對象發火，但推測他紓解負面情緒最大的管道可能是寫日記。只是這些情緒的記載多半很簡單，研究者需要以其他資料輔佐，才能了解他為何對某個人或某件事產生強烈的負面情緒。²⁴

蔣介石對核心幹部的不滿之處頗多，如陳誠是他忠實的追隨者，蔣也認為陳將繼承他在國府的領導地位，但日記內對陳的批評明顯多過對其他下屬，不過多半只記評語，很少同時寫下讓他不滿的具體的事件或原因；有些地方就算記了原

²²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61.10.30。這是蔣在慈湖看到他的壽堂布置所發的感想。

²³ 研究蔣介石的專家楊天石認為，蔣五大壞毛病之一就是「暴躁、脾氣很壞」，見楊天石，〈鬼？神？人？：解讀蔣介石日記〉，《文史博覽》2006: 21，頁 32。

²⁴ 筆者所閱讀的日記中，記載情緒不佳最長久，也有具體原因者，是為了 1957 年底監察院彈劾行政院長俞鴻鈞所引申的各種問題，讓蔣在 1958 年最初幾個月中，反覆思索如何引導黨員重新認識革命的性質，常常在日記中記下悲、悶、怒、憂、憤、沈、愁等各種表達負面情緒的字眼。

因，也多半簡短、抽象。例如 1959 年 1 月 22 日記到：「昨日為辭修不誠之言行，頗為黨國憂慮。好用小智而不識大體，更不能察人善惡與好聽細言，此皆不能成大事之原因，望其能自反自改也。」1959 年 3 月 24 日罵陳誠不聽指示，只學政客，「不知革命之道」，讓他為國民黨與革命前途覺得忿悶。1960 年 8 月 3 日則「明示辭修彼已為元首候補者，國家前途、人民禍福將來全寄於彼身上」，告誡他要嚴謹自修，不要讓「中外友好人士」失望等等。²⁵ 蔣也常在日記罵黨秘書長張厲生與其他黨中央的主要幹部，說他們「形成為官僚政客的一群，簡直是無志氣、無作為、無出息的酒囊飯桶，如何能表率群輪，振作革命精神，完成反共復國、實現主義之使命？」這樣的幹部讓他「心神苦悶」。²⁶ 本來共事不一定就有共識，接觸多摩擦機會也跟著增多，蔣不見得每次心中不滿都會向當事者挑明，在日記發洩情緒是很自然的現象。

日記顯示：讓他產生負面情緒最多的對象是被視為國府「救星」的美國。蔣介石對美國的援助當然感激，但對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導的角色有相當高的期望，故對其保守的冷戰政策與行動多所不滿，更難消受其對國府的態度。²⁷ 但礙於實際考量與外交原則（還有自我修養的要求），蔣介石常告誡自己與美方應對時，必須壓制自己的情緒，不過事後會在日記中發抒，對不滿的原因也較不隱諱。如 1958 年八二三砲戰時，蔣介石要求美國准許國府對進攻的中共空軍基地做報復性攻擊，美國擔心衝突擴大故不肯答應，蔣介石說他只向協防司令史慕德（Roland N. Smoot）抱怨美國「『殘忍』與『太不平等』、『太不人道』」，警告說這會讓臺灣軍民「對美國增加無窮反感」，並要求美國重新考慮，接著自記：「此乃極端情感不良之下，仍能以理智控制，並不現激昂之色，此或修養之效。」²⁸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當年 10 月底來臺商討外島問題第一次談話時，蔣認為杜勒斯的提議無異於要國府「求和投降」，為兩個中國張本，「心中痛

²⁵ 陳永發院士告訴筆者：陳履安院長曾告訴他，蔣介石與他父親（陳誠）常常大吵，常得勞動兩位夫人出來說和。

²⁶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1.26。

²⁷ 如他在 1951 年夏天就形容自己「對美國觀念根本變更無異惡夢初醒」，「如我不求自立，則國家民族皆無生存於今後世界之餘地。」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1.07.31。

²⁸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8.31。不過參謀總長王叔銘卻記下蔣當時「講話失常，大發牢騷」，讓史慕德「進退兩難」，也讓王「深以為不忍」。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王叔銘將軍日記〉19，1958.08.31。顯然蔣的自我感覺與他人的觀察還是有明顯的落差。

憤，忍之又忍，故仍對杜未發憤色也。」²⁹

另外，對於讓他不滿的外國人士，蔣介石會跳過臺灣媒體基本上採用的中央社標準譯名，改用負面字眼來翻譯他們的名字，可能也達到某種程度抒發情緒的效果。例如調停國共內戰的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將軍被他寫成「馬下兒」；冷戰中採取中立甚至「媚共」立場的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在他的日記中被貶成「泥黑路」；俄共總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他則稱為「黑裡雪夫」或「黑魔」，甘乃迪（John F. Kennedy）政府的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因為傾向兩個中國而被他稱為「魯丑」，尼克森總統（Richard M. Nixon）在開始與中共正常化進程後則被稱為「尼丑」等。以上例子顯示：蔣會藉書寫日記抒發他的負面情緒，讓他不致於因為公開發洩怒火而傷害自己的形象或影響到與黨內同志、部屬、盟國的關係，甚至損及國府的政策或實際利益。日記也顯示：在處理重大問題或危機時，蔣會記下自己的焦躁，發脾氣的頻率也明顯增加，但他會立即覺察與反省。

抒發負面情緒之外，蔣介石還會在日記中記載對自己身體狀況的憂慮。1958年6月底他左眼血管破裂，讓他困擾了好一陣子，甚至得將日記的字體放大、儘量減少閱讀的時間，還好幾週停止寫星期反省錄與預定工作項目以節省眼力。此外，八二三砲戰之後他發作了數次暈眩，這雖然是老毛病，但在精神緊張的狀況下，發作的頻率明顯增高，所以他在該年年底時寫下：「腦暈時起，目疾未減，殊是憂慮。」³⁰而失眠更是長年困擾他的問題，尤其精神緊繃、思索重大問題、處理危機或集中精神修改文稿等情況下，常常得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偶而不用安眠藥就睡了個長覺，還會特別記載下來：「近日睡眠甚佳，每夜可熟睡七小時之久為樂。」³¹就算是「偉大領袖」也難免要受病痛折磨，既不宜公開病弱姿態以免影響政治局勢或民心士氣，恐怕也只能在日記中傾吐煩憂。

日記第三個功能是作為修身的紀錄與警惕，在局勢刺激下反省過去的經驗與錯誤，則常常被引為決策的參考。蔣介石尊崇儒家思想，服膺「吾日三省吾身」的原則，而反省對僕役發脾氣之紀錄，最能凸顯日記的修身作用。例如他曾記到：

²⁹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0.22。

³⁰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2.31，「上月反省錄」。

³¹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9.02.06。

「以火爐不修，滿廊冒煙，不勝憤怒，因侍從孝鎮說謊欺主也，此乃近年第一次大惱，何不自愛至此。每朝默誦『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之篇，幾乎卅餘年，而今仍不自修至此，何耶！應記過一次。」還有一次因佣人「懶慢不盡職守者二次，乃決心開除，但為此惱怒憤慨又自傷元氣為憾，應加克自修養。」³² 以元首之尊，卻因對待僕從發火而記自己的過，可見蔣對自我修養的要求與日記自我提醒的功能。³³

蔣在每年日記的最前面，會寫下一些「座右銘」之類的箴言，並經常在每日記事時，以他當時最重視的箴言來檢驗自己實踐的程度，若自覺達到自己的理想則自我嘉獎，若沒達到則提醒自己要警惕努力。例如八二三砲戰期間，蔣常因內外情勢而「憂心忡忡」，故對美方人士或部屬有時會顯得急躁嚴厲，但他在發過脾氣後會在日記中自責這是「修養不足之證」，要求自己「力戒」，以免「小不忍則亂大謀」。³⁴ 由日記的格式與書寫的習慣及內容可知，蔣介石除了當下（或至少記日記之時）清楚自己的情緒外，也經常（每週、每月、每年）回頭檢視自己的身心活動與政策思考，藉此修身並調整政策。例如 1958 年 8 月初外島局勢開始緊張時，蔣在日記中寫下：「每思朱子以『急迫浮露』四字自反，而余更覺此四字實為一生最大之病根，昨日在軍事會談中暴露無餘，其將何以立業率人乎？今後必須以寬厚深沉自矢，以期挽救于萬一也。」砲戰期間的日記顯示：「急迫浮露」是這段預想中共即將發動攻擊的期間他自覺最常犯的毛病。砲戰爆發後金門運補發生困難時，他又記到「近日性情又現急迫浮露之象，應如何學到寬緩深沈之態，當切實自修，以免重蹈三十七年冬之覆轍，戒之、勉之。」³⁵ 「急迫浮露」這個箴言，也是蔣介石在 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初最常用來批判自己的話，

³²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9.02.21，「上周反省錄」、1960.10.16。

³³ 自我要求並不等於達到理想，日記顯示蔣還是經常因類似的情境而發怒，也持續反省。筆者以為這樣的紀錄正顯示他的「凡夫」面向——理想與實踐有很大的差距，但卻不因此差距而放棄理想或努力。

³⁴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9.02、1958.09.03。9月3日蔣因砲戰中運補失利痛斥軍事幹部，事後反省，回想到 1948 年冬痛斥衛立煌的「失態」，導致東北失陷的後果，要求自己「切改」，否則會「小不忍則亂大謀」。

³⁵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8.07、1958.09.04。但這顯然是蔣一生難改的毛病，遇到狀況便會表現出來，如 1961 年外蒙入會案與美協商期間，他又自言「自知性燥心急，為一生之大病」，又說「急迫浮露」為「一生痼疾」，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61.09.02、1961.09.09，「上星期反省錄」。

「寬厚深沉」則顯然是他自我要求的境界。

對蔣介石而言，歲末、元旦或生日等特殊的日子，都是提醒自己反省與發願的機會。如他在 1957 年除夕記下對自己精神、德行、修養、學術、智識、工作各方面進步的嘉許與生活環境的感恩，隔日則寫下事業與歷史（顯然是指反攻大業）可不必再研究，只要照預定方針前進，但信仰方面則須再加強，否則「將要虛度一生而成為毫無意義的人生」，要照基督信仰「求得新的生活、新的生命，完成我新的人生展示，不辜負天地父母生了我這樣一個人。」³⁶ 1959 年初在做前一個月的反省時，則記到：「近來容忍與憤恨之情性相互發見，而且恩怨盤旋不「能放懷」（刪去此三字）易遺忘，此乃修養不足，所謂庸人自擾，何苦如此？應加戒免。」³⁷ 如此自比為「庸人」的描述顯示了蔣的凡人面向，與對自我修養要求的程度。

這樣自我要求與不斷修身練習的結果，讓他在重大問題發生後，就算當下發了脾氣，過後也通常會先檢討反省自己的責任，引為日後的借鏡。例如八二三砲戰結束時，蔣與杜勒斯發表了被認為是放棄武力反攻的聯合公報，讓他遭受國內外與僑胞輿論的大力抨擊（見下一節討論），這對於以反攻為職志的蔣介石當然是很大的壓力。他當天認為錯誤主因是自己疏忽、沒有核對翻譯的稿子；過幾天整體思考會談的過程，他記下自己沒有預先料到杜勒斯的要求，談話時既沒有把握重點、亦無固定目標，「所以最後只有所予，未能有所取。」雖然他也怪幹部未能預測美方意向，或者指出葉公超「誤譯」，但當時還不認為葉公超是有意的，在感嘆手下無人之餘，還是認為自己該負主要責任。³⁸

³⁶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7.12.31、1958.01.01。

³⁷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2.31，「上月反省錄」。

³⁸ 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0.23-24、1958.10.25，「上星期反省錄」、1958.10.31，「上月反省錄」。後來蔣對葉公超開始不滿、不信任時，才認為「公超竟如此欺主，無異賣國，殊甚痛心！」見寫在書眉的日後補記，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0.24。補記的日期不知，但蔣到 1961 年 4 月之後，開始非常不信任葉公超，到 1961 年 10 月為了外蒙入聯合國案將他解職時，已經稱他為「葉逆」。利用蔣日記所描述外蒙入會與葉公超解職經過，可見阮大仁，〈由蔣中正日記去看葉公超大使去職之經緯：「侮辱政府」、「奸詐欺騙」、「賣國漢奸」三罪併發（一）-（四）〉，《傳記文學》96: 6-97: 3（2010 年 6-9 月）；王正華，〈從蔣中正日記看 1961 年對美交涉〉，發表於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2010 年 12 月 2-3 日。

有關大陸失敗原因的自我檢討更是嚴厲。蔣介石在遷臺之後，就不斷在公開演講中檢討失敗的原因，³⁹ 日記中的自我反省自然也不在少數，直到遷臺十年後還持續反省，且對自己毫不留情。例如他理解到「憤慨與抗辯是為余失敗後之病態」，且大陸失敗前對重大軍政外交問題「皆不能有健全之幕僚與顧問組織，事前作切實檢討及精密之研究與計畫，此即獨裁武斷之所為，此後能不切戒乎？」他也認為自己「知人不明、用人不當」，同志榮辱與共者寥若晨星是因為「自我缺陷太多」，癥結則是「誠而不實」。被人輕侮欺凌「皆為自我無識無學，甚至自大自是，特別是自作聰明以致坐井觀天，而無怪於人也，及今速改或尚未晚乎？」⁴⁰

過去經驗的反省中，大陸失敗的原因無疑是最長久、最突出的，只要遇到足以引發失敗記憶的情境，蔣介石就會反思當年失敗的原因。而無論對自我與外在環境的反省，都無可避免地影響了他在臺灣的決策思惟與實際行動。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反省讓他產生對「無限制民主自由」與「匪諜」的恐懼與痛惡，認為這是大陸失敗的主因之一，他對《自由中國》雜誌的態度則可顯示這樣的反省對其實際決策的影響。對《自由中國》1956年10月底「祝壽專號」的批評，蔣還認為「今後對於自由文人之政策，只要其無匪諜嫌疑與關係者，則其反對政府與惡意批評皆可寬容不校，以此時反蔣之惡意言論不能減低政府之權威也。」1958年春天，即該刊於前一年開始發表「今日的問題」相關社論並引起社會呼籲國府改革後，他已經認為這很類似大陸淪陷前民主同盟等團體要求「無限制的民主自由」，卻被中共利用而「造成今日大陸人民空前之浩劫」。1960年秋決定逮捕雷震後，他認定雷震的文字類似共產黨的辯論技巧，是在為「共匪作有利宣傳」；「如要縱容共諜，則今後不能再談反共救國，不如讓其在大陸淪陷以前公開顛覆國家；如果要保護言論自由，就不能放任掩護共諜的假借民主自由為口號，做公開為共匪作有利宣傳而重蹈大陸淪陷之覆轍。」⁴¹ 顯然對大陸失敗的反省，讓他對中共宣

³⁹ 公開演講中的檢討可見劉維開，〈蔣中正對1949年失敗的檢討：以演講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9（2008年5月），頁85-125。整體遷臺反省可見楊天石，〈國民黨遷臺與蔣介石的反省〉，收於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頁452-474。

⁴⁰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6.11.14、1958.02.24、1958.03.31，「上星期反省錄」、1958.06.29，「雜錄」（1958.05.08記）、1959.01.24，「上星期反省錄」。

⁴¹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6.11.28、1958.03.25、1960.10.31、1960.11.05，「上星期反省錄」。蔣介石在祝壽專號刊出後，對第43次反共抗俄總動員會議指示：如果批評屬實，就應採納改進；若係中共故意污蔑，則需加辨明。見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2（2009年11月），頁249。

傳與匪諜滲透時時提高警覺，負面效果則是「一朝被蛇咬」的記憶讓他難免「杯弓蛇影」，影響了他對批評者動機的解釋與容忍度。

最後，從內容的比例來看，日記最重要的功能是作為協助他思考的「草稿紙」。通常蔣介石每日記事的第一段（篇幅多為後面記事段的兩倍以上），是記載他對政策的概念或應採行動的想法，有時只簡單條列，有時則長篇論證（若當日日記中寫不下，會延展到第二天日記的摘要部分，或者寫到大事表、反省錄、雜錄等欄位中）；這些想法常常是他在失眠或清晨醒來時思慮所得，也常因此導致政策轉彎。例如1961年10月初有關在聯合國否決外蒙入會的問題，他在10月2日清晨4時醒來，想到透過中情局臺北站長克萊恩（Ray Cline）的管道、略過國務院，直接與甘乃迪總統溝通，以美國否決中共入聯合國交換國府不否決外蒙入會。⁴² 他在接見重要外賓之前，會先思考並在日記上臚列希望提出討論的重點；在發表重要聲明或文告之前，也會先在日記上寫下草稿或要旨。尤其是他認為比較重要的問題，經常會連續在日記中跟自己討論，重複寫下各種想法與可能性。他認為重要的宣示，則會累月甚至經年的在日記中琢磨。

蔣介石在臺時期的專著如《反共抗俄基本論》、《蘇俄在中國》等的構思與修稿，固然花了他非常多的精力，⁴³ 短篇宣示性講演如1958年7月16日對中央評議委員第一次會議講的〈革命民主政黨的性質與黨員重新登記的意義〉也花了他差不多半年的時間仔細斟酌修改；到6月底發作眼疾，他還認為是因為長時間修稿「用心過度、文字太細」的原故。⁴⁴ 而當年在砲戰中的國慶日，正值全球輿論要求國府放棄金馬的高潮，更需要藉此重大節日鼓舞軍民士氣、堅持到最後勝利，故蔣介石從10月5日開始親自起草國慶文告，每日花相當多時間修改文稿，

⁴²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61.10.02、10.03。一般都認為這是外蒙入會案的轉捩點，此案透過克萊恩交涉的細節可見涂成吉，《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第五章第一節；王正華，〈從蔣中正日記看1961年對美交涉〉一文則用日記與外交檔案詳述蔣與國府的想法與立場。

⁴³ 以日記資料來建構此兩種專著完成的過程，可見段瑞聰，〈蔣介石的繼續革命論：第三期國民革命中心理論的形成〉，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學術研討會」，2010年9月4-5日；本文日文版請見，段瑞聰，〈蔣介石の第三期國民革命中心理論〉，《慶應義塾大學日吉紀要·中國研究》4（2011年3月，出版中）；以及陳立文，〈從蔣日記看蔣介石與《蘇俄在中國》〉，收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蔣介石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2010），頁241-250。

⁴⁴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6.27。

一直到 9 日下午廣播前才定稿。結果他自認為除了一小段有所不足外，「全文皆甚得意也」，還因為美國各報社論的評述，讓他自覺此文對美國發生了重大影響。⁴⁵ 到了 10 月下旬，為了杜勒斯訪臺，蔣更是連續數日在日記中推敲想跟杜勒斯討論的重點。⁴⁶ 逐日閱讀的讀者可以清楚看到他思考內容與情緒感受的變化，無疑能豐富對他決策邏輯的解釋。

蔣介石之所以習慣花這麼多時間修改自認為重要的文稿或宣示，是因他認為「長篇文字必須有較長時間從容修飾，方能臻於充實耳。」⁴⁷ 而他在竭盡心力修改 1959 年元旦文告時，還記到「本日修稿時又昏暈一次，幾乎不識人事為慮。」⁴⁸ 他對某篇文稿所投注心力反映了他重視的程度，若只是「虛言」或反共八股的制式宣傳，應該可以不必費這麼多心力，故日記中顯示他所親自撰寫或作重大修改的聲明文告等著作，應該可以反映他希望傳達出去的想法與真正的關懷或信念。

四、日記中顯示的關懷重點

蔣介石並未（也不可能）把他經歷過的所有事件的前因後果或思惟決策過程都記在日記中，⁴⁹ 故讀者從他選擇記載的內容可以看出他關懷的重點。另外。他在遇到重大問題或困擾時，通常會長時間在日記上記載他對此事的考慮與變化，這些焦點則凸顯了蔣階段性的重大關懷。大抵而言，日記中篇幅佔最多的是軍事相關問題。蔣常在日記上寫冷戰相關的戰略構想、軍方人事調動的思考、軍隊校閱情況、軍校畢業典禮致詞，還有他閱讀軍事理論書籍與各國戰史、名人傳記等的重點與感想。從筆者瀏覽過的 1950 年代中期到 1960 年代初的日記看來，反攻大陸的政略與戰略，無疑是蔣介石最關心的。雖然作戰計劃由國防部負責擬定，

⁴⁵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0.05-11。

⁴⁶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0.18-22。杜勒斯來臺前也親擬並修改想要提出討論與協商的重點，記在草稿紙上，收在杜勒斯的個人檔案中。所以蔣介石的日記功用之一，可說是作為他個人寫下他思考問題的草稿紙。

⁴⁷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3.07。

⁴⁸ 12 月 29 日當天連續修元旦文告稿將近 10 小時，31 日定稿後還記下「真使人苦熬矣！」，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2.29-31。

⁴⁹ 可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頁 xix 的討論。

但他常在日記中寫下一些想法，再交給國防部去處理執行相關細節、擬定計畫，最後由他審定、交下重覆修改後再定案。例如 1958 末到 1959 年間，由於蔣在八二三砲戰期間曾公開聲明不以金馬外島為「反攻大陸的跳板」，故他在日記中不斷與自己討論從「陸上」反攻的方法，逐漸在發展出從滇緬邊界反攻的「武漢計畫」。⁵⁰

至於軍事理論與戰史，本來就是他喜愛閱讀的主題之一，⁵¹ 在準備反攻之際，更要研讀各國名將（包括中共與蘇聯統帥）所寫的戰略戰術理論。例如 1958 年他整年閱讀的是法國福煦元帥（Ferdinand Foch）的《戰爭論》（*On the Principles of War*），還很遺憾沒在二十年前讀到此書，「故每日誦讀，不忍釋卷，以其理論與法例似多適合於我國今後之戰爭也。」⁵² 除了在日記中摘要這些書籍的重點與閱讀的感想外，他也常指示將領們要閱讀指定的軍事書籍，讀完後要繳交心得報告，他並親自批閱與獎勵優良作品，有些還加以編輯出版。例如 1958 年 4-5 月間，他批閱並編輯了《蘇俄軍事思想》⁵³ 之將領讀書心得，並視此為他當年「軍事著作之成就」。⁵⁴ 而世界名人傳記與各國歷史（尤其是美國與蘇聯）則讓他更深入了解敵、友，可作為決策的參考，⁵⁵ 也藉以修正他自認為在大陸失敗原因之一。⁵⁶

⁵⁰ 武漢計劃的執行與後續發展可參考賴政訪錄，《賴名湯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4），內〈執行春曉計畫的經過〉一節；覃怡輝，《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第三章第三節。

⁵¹ 蔣介石的閱讀習慣，可參見王奇生，〈蔣介石的閱讀史：以 1920-1940 年代蔣介石日記為中心的探討〉，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 年 9 月 14-16 日。王奇生指出，蔣閱讀主要是儒家典籍、兵略政術與各國革命史。他在 1950 年代閱讀的書籍很類似，但花更多的時間閱讀基督教靈修的相關書籍。此文的英文版本見 Qisheng Wang, "Chiang Kai-shek's Reading: an Inquiry Based on Chiang's Diary, 1920s-1940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1 (June 2009), pp. 11-25.

⁵²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2.06，「上星期反省錄」。

⁵³ 格爾多夫（Raymond L. Gartroff）著、鈕先鍾譯，《蘇俄軍事思想》（臺北：軍事譯粹社，1957）。此書原文為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3).

⁵⁴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2.31，「全年反省錄」。

⁵⁵ 閱讀計劃的書目例子，可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民國四十八年大事表」。

⁵⁶ 蔣認為：「過去在政治外交上之失敗，最大原因為欠缺世界智識，尤其對美對俄對日，對英法德各國之歷史背景，及其民族性之欠缺研究也。」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60.11.22。

其次關懷的是黨務問題。國民黨遷臺後經過 1950-1952 年的改造，大抵消除了破壞性的派系鬥爭，也確立了「革命民主政黨」的認同，並以反攻大陸為最高目標。⁵⁷ 只是當數年過去，反攻大陸軍事行動卻遲遲無法啟動，「國民革命」顯然陷於停滯時，黨內士氣又逐漸渙散，派系鬥爭的老毛病再度浮現。⁵⁸ 此外，1950 年代後半期之後，黨外人士透過如《自由中國》、《公論報》等媒體，要求國府改革的聲浪逐漸升高，部分黨員則隨聲附和。蔣介石發現要讓黨內同志們完全照著他的意志，完成「國民革命第三期」的任務，同心齊力為「反攻復國」大業而奮鬥，並沒有那麼容易。黨內分歧到了 1958 年初監察院彈劾行政院長俞鴻鈞案時公開顯現，⁵⁹ 蔣介石認為這是遷臺八年以來碰到最嚴重的問題，因為這顯示國民黨失去了「革命性」，不但無法執行反攻任務，也會遭到臺灣人民的唾棄不滿，最終恐怕連立足臺灣都有困難。他感嘆：「對於一般黨務之無知識與方法，不能生存於現在之世界，甚為苦悶。尤其內地來臺之民意代表與知識分子，驕橫惡劣，不知其為臺籍人民之輕侮賤視，將無立足餘地之環境，茫然不悟為憐。」⁶⁰ 他也花了很多的時間謀求對策，甚至一度灰心到不敢設想反攻前途的地步。⁶¹ 日記顯示：黨務、黨內團結與維持同志的革命精神等問題確實佔去他非常大的精力與時間。

⁵⁷ 馬若孟、林孝庭，〈揮別過去：遷臺初期的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1950-1952〉，下載日期：2009 年 11 月 30 日，<http://www.hongfan.org.cn/file/upload/2008/12/12/1229501775>。

⁵⁸ 鬥爭的輪廓可參見林婉平，〈從 1958 年出版法修正案看國民黨「CC 系」對黨中央的挑戰與式微〉，《史匯》13（2009 年 10 月），頁 1-30。國民黨改造可能讓黨權較集中，但派系問題並未完全解決，可參見任育德，〈蔣中正對國民黨的省思與改造，以 1949 至 1952 年為中心〉；以及林婉平，〈蔣中正遷臺初期對國民黨派系問題的檢討與整頓：以 CC 系為中心〉，兩者均發表於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主辦，「蔣中正研究學術論壇：遷臺初期的蔣中正，1949-1952」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0 月 30 日。

⁵⁹ 1957 年底，監察院因為行政院長拒絕監察院糾正美援運用委員會人員待遇過高、未能改善軍公教待遇，且拒絕到監察院備詢、非法兼任中央銀行總裁等原因，通過彈劾俞鴻鈞案，並移送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結果是議決申誡一次。俞鴻鈞在 1958 年 2 月 14 日收到懲戒決定後辭職，但被蔣慰留。監察院彈劾行政院長俞鴻鈞案全文見《聯合報》，民國 46 年 12 月 24 日，第 3 版，並見該日的相關報導與社論。

⁶⁰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1.18，「上星期反省錄」、1958.01.24。

⁶¹ 1958 年 1-7 月間的日記，顯示蔣介石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如何處理黨紀與黨員團結問題，甚至 3 月 8 日在日記上寫下「近日對於國際情勢與反攻前途皆不願作深入思考，乃有聽天由命之想，可乎？」這樣幾乎自承挫敗的語句，可見黨務問題困擾之深。當年度的兩篇主要訓詞顯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參見蔣介石，《本黨又是面臨時代一次考驗》（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8）；〈革命民主政黨的性質與黨員重新登記的意義：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對中央評議委員第一次會議之指示〉，收於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4），第 27 卷，頁 237-277。另外可參考陳紅民，〈1950 年代後期蔣介石應對突發性事件之研究（之一）：處理「彈劾俞鴻鈞案」〉，發表於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2010 年 12 月 2-3 日。

第三個重要關懷是冷戰國際局勢。由於國府的生存與發展，尤其是反攻大陸的國策，和全球冷戰關係密切，故蔣介石非常關心國際局勢的變化。他最關心的是蘇聯和中共領導的一舉一動與此兩者的內、外政策——包括他們在全球各地的「侵略」行動，或與非共國家的合縱連橫。而蘇聯與中共的互動，例如1959年毛澤東不再任中共國家主席與中蘇分裂的各種跡象與意涵，都讓他不斷在日記中推測各種可能性與對國府的影響。他也極關心中共國際地位提升的各種徵兆，因這會直接威脅到國府作為中國政府的正統性，也認為這是中、蘇共最重要的「陰謀」。例如1958年夏天，中共可能受邀參加解決中東問題⁶²各種高峰會的訊息就讓他十分緊張，他記到高峰會的出席與席次問題「最令人難堪」，「務望能有一日湔雪此種不應有之耻辱耳。」⁶³

其次的焦點是美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特別是美國對共黨國家或親共集團行動的回應。當然他最關切的是美國政府對臺灣的各種政策、行動，以及美國輿論對國府的各種看法，例如八二三砲戰期間他就大量記載有關美國國內的民意與華府決策者的思考、政策與行動等訊息。1960年美國大選的例子更顯示蔣對美國國內政治動態的關心，當時甘乃迪在與尼克森競選辯論時主張放棄外島，他擔心民主黨的甘乃迪當選後重蹈杜魯門政府「一筆勾消」國府的政策，⁶⁴或不利國府防守外島、反攻大陸與爭取美國軍經援助，故他記下與夫人通宵不眠在臺灣為尼克森助選。⁶⁵其他「自由世界」國家與共黨國家的互動與輿論的傾向，也是他長期注意的對象。除了當日記載國際重大事件外，蔣介石通常會在星期或月反省錄的部分，記下那段時期內主要冷戰局勢發展，也會將重要的報導或社論剪下來貼在日記中；偶而則剪下報紙上的一週大事紀要，代替自己書寫的國際局勢摘要。觀察蔣介石對美國政策、輿論，以及整體冷戰情勢的解讀，與史家對同樣事件的解釋相對照，應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的想法與限制。

⁶² 伊拉克於1958年7月14日發生政變，推翻親西方的費賽爾國王，鄰近的黎巴嫩總統夏蒙向美國求援，美國乃派海軍陸戰隊於7月15日登陸黎巴嫩；英國傘兵部隊則在兩天後降落約旦，法國也派艦隊在黎巴嫩外海應變，蘇聯則同時宣布在黑海等地區舉行大規模三軍演習，國際局勢因而緊張。

⁶³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7.26，「上星期反省錄」。

⁶⁴ 一般對杜魯門政府對國府的政策都說是「袖手旁觀」(hands off)，蔣的用語卻是更激烈的「一筆勾消」，例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61.09.09，「上星期反省錄」。

⁶⁵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60.11.02、06、09。但日記中未描述如何在臺灣助選。

日記內容的第四個重點是宗教與家庭生活。前面已經提到，蔣介石每日早午晚三課的宗教靈修長年不斷，遇到問題時也常常表達對上帝的感恩與祈求，故宗教無疑是他革命事業與個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元素。⁶⁶ 例如他在 1958 年的雜錄中就寫（抄）下「惟有進入靈性生活的生命最深處，快樂、忍耐、仁愛、信心、溫和、自制，乃得謂之最高的勝利生活」這樣的句子。⁶⁷ 除了軍事、歷史書籍之外，他也花了很多時間閱讀基督教的靈修書籍。1958-1959 年間主要閱讀的宗教書籍是《勝利生活》⁶⁸ 與《荒漠甘泉》兩書。日記中顯示他對後者尤其重視，除精讀並重新審訂其譯文外，還自己編寫 1 月 1 日的「課」，將本書重新出版。⁶⁹

宗教生活外，日記內容也顯示蔣介石對家庭成員的陪伴與感情的重視。蔣夫人宋美齡在臺灣時，他記載夫人陪他散步、車遊、出巡、觀劇，且他對夫人的情感與依賴似乎隨著年歲而增加：「與妻親愛，至老彌篤，家庭和睦，每日增一日，此為人生在患難中最大之幸福。」⁷⁰ 家庭和樂的撫慰作用，甚至可以幫他克服情勢不如意的壓力，讓他得以安眠。⁷¹ 1958 年 5 月 21 日夫人出國治病，到次年 6 月 18 日才回國，這段期間他雖有其他家人陪伴，還是會覺得寂寞；夫人回國後他則自記「自夫人回國以後，家庭團圓和愛，乃為平生最大之快樂也」，⁷² 而且還連續幾天在日記中重述他對夫人回家的欣喜。

⁶⁶ 韓國學者裴京漢指出，蔣介石在 1936 年西安事變之後，才真正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後來他將宗教與革命事業結合，基督教不僅增進他的人品，還可拯救中國。見 Bae Kyoungan, "Chiang Kai-shek and Christianity: Religious Life Reflected from His Diary,"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 1 (June 2009), pp. 1-10.

⁶⁷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2.31，「雜錄」。

⁶⁸ 此書可能是指無名的基督徒 (An Unknown Christian) 著、胡恩德譯，《勝利生活的秘訣 *How to Live a Victorious Life*》(香港：宣道出版社，1950)。

⁶⁹ 此書英文第一版出版於 1925 年，為 Mrs. Charles Elmer Cowman (Lettie Burd Cowman) 所編的書 *Streams in the Desert*，是每日一則的基督教靈修書。蔣介石整編後的版本應該是高曼夫人撰、王家楫編譯，《荒漠甘泉》(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0)；他所閱讀的可能是臺北新陸出版社 1957 年出版的版本。由於蔣介石的提倡，這本書可能是臺灣最具知名度的基督教靈修書籍，一直到目前為止，每幾年都會有不同的出版社再版印行。

⁷⁰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3.24。

⁷¹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60.10.29，「上星期反省錄」。

⁷²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0.27、1959.06.20。日記中有關蔣宋感情記載的討論，可見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一書，頁 433-494 的三篇文章。

夫人不在臺灣時，多半是由蔣經國的兒子蔣孝武、蔣孝勇陪著散步、車遊、出巡到外地；他有時還帶這兩個孫子到總統府辦公。⁷³ 蔣常寫下帶兩個孫子出遊、逗狗玩耍的樂趣，例如1958年9月21日記：「昨夜帶武勇散步至後公園草地上，席地橫臥觀月，意其澹泊自得。間又觀兩孫與佩朗（狗名）玩耍爭噪，亦樂也。」⁷⁴ 不捨孫子離開時，還感嘆「彼尚年輕，不知祖父愛心之切，乃即回憶當余少年時，離家讀書之際，先慈不忍離別之心如何情形矣。」⁷⁵ 蔣經國也常陪他車遊、出巡，父子倆在車上討論國事。而在困頓的砲戰中，他發現兒子蔣經國變成最值得信賴的革命夥伴：「近來最足自慰的一點，就是經兒隨身協助一切，甚感父子共同作戰、相依為命之精神效力，其比任何部屬協力工作之成效，不啻十倍，惟此更覺興奮其對我革命事業之補益，不可以言語所能達其十一耳。」⁷⁶ 至於蔣家其他成員則比較少出現在日記中，通常只記到他們年節與生日時來祝壽聚會。

從日記重點可以看出，蔣介石最關心的是與「反攻大陸」有關的軍事、外交、內政、宣傳等問題。他認為若是不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國府的存在就沒有意義；⁷⁷ 甚至覺得率軍反攻、光復大陸比當總統還重要。⁷⁸ 他對軍事、黨務、冷戰等問題的關注，都是為了「反攻大陸」這個政策目標，而反攻則是為了完成「革命」的使命。⁷⁹ 完成之後可以「雪恥」——不只是雪個人之恥，最主要的是要雪整個中華民族從清朝末年以後持續受列強侵侮之恥，恢復中國往昔的富強與榮耀——而這

⁷³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9.01。

⁷⁴ 偶而他也會只帶狗作伴散步車遊。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9.21、1958.09.28。

⁷⁵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9.10。

⁷⁶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9.20，「上星期反省錄」。

⁷⁷ 蔣介石1959年元旦寫到「今日第一思潮：大陸人民情景至此，如我不能自動興起解救同胞，而惟以國際情勢與美國政策相依從，則今日政府之存在究有何意義？而且建立此一力量更有何作用？尚得靦顏自解乎？」見胡佛檔案館，〈蔣介石日記〉，1959.01.01，「本月大事表」。

⁷⁸ 1957年間，他在日記中設想若說服美國不阻礙國府反攻不成功，他就辭去總統職位，專任反攻軍總司令，以擺脫防約的束縛。1959之後，總統任期問題浮上檯面，他也認為不當總統無所謂，只要任國民黨總裁與反攻軍總司令，領導反攻完成國民革命任務即可。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7.07.04、1958.12.27，「上星期反省錄」。這些想法不只一次出現，故須看整體的日記才能了解他整體反攻思维的變動情況。

⁷⁹ 蔣介石在遷臺之後，就已經將國民黨的性質定位為「革命民主黨」，至於他本人則領導國民革命的責任與權力比擔任總統更重要、更不能推卻或放棄。見段瑞聰，〈蔣介石的繼續革命論：第三期國民革命中心理論的形成〉。到1950年代末，他對革命民主黨意義的想法，可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3.21-23。

廣義的「雪恥」似乎是成長於清末民初的「革命」與「五四」世代的「有志青年」共同的心願。⁸⁰ 雖然他是中華民國的「總統」，但「革命」事務之外的內政與行政相關問題，卻鮮少出現在他的日記中，這就清楚反映出他關懷的重點，甚至個人的角色定位。

五、屢敗屢戰的生存之道

無論對蔣介石個人或他領導的國府評價如何，從日記內容與客觀史實來看，他「革命人生」中的成功與榮耀都很短暫，挫敗與受辱的時間較多。或許他曾在臺灣建立了「專制」政權，也享受了至少二十年「偉大領袖」的尊榮。⁸¹ 但 1950 年代後期日記中所反映的蔣介石，與其說是可以呼風喚雨、為所欲為、專斷獨行、冷酷無情的獨裁者（或「偉大領袖」），不如說是個屢戰屢敗，處處、事事、人人都不同意，人生經歷多半是挫折的老人。如前所引，他在 1959 年除夕時，自認是處在「空前挫敗與恥辱重重之中」。⁸² 既然如此，到底是什麼樣的心理機制支撐著他，讓他在幾乎是持續不斷的挫敗恥辱中，還可以「屢敗屢戰」？⁸³ 筆者的好奇在閱讀蔣八二三砲戰期間的日記時，似乎看到了一點端倪——他遇到挫折時常常迅速轉念作心理調適，不會讓自己長期處在負面情緒之中。這應該是他在不

⁸⁰ 當然這個心願的強弱與堅持度，以及理想中建國內容就算在國民黨人中也是因人而異。蔣介石希望他領導的是「團結合作」的「革命民主政黨」，但無論任何時期，同志們顯然與他不怎麼「一心一德」，革命也就難以「貫徹始終」。有關蔣介石的革命理念，可參看段瑞聰，〈蔣介石的繼續革命論：第三期國民革命中心理論的形成〉。

⁸¹ 馬若孟與林孝庭認為國府在臺專制相對溫和，雖然蔣比過去以往任何時期都擁有更充沛的權力，見馬若孟、林孝庭，〈揮別過去：遷臺初期的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1950-1952〉，結語。但其他強調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迫害《自由中國》雜誌並箝制思想自由的史家，可不這麼認為。不過學界對國府與蔣在臺灣實行「專制」似乎有個共識，只是到目前為止，筆者對蔣介石在臺灣「專制」的「程度」有些懷疑。

⁸² 記得楊奎松教授在閱讀選輯自蔣介石日記的《困勉記》（收在國史館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內）時，曾對筆者感嘆地說：他要是蔣介石，日日都這麼挫折、痛苦，不知道要怎麼活下去？筆者沒有閱讀過《困勉記》或 1950 年代之前的蔣介石日記，但 1950 年代之後，雖然蔣在臺灣的生活相對安定，但他最在意的「第三次國民革命」志業則各方面都無法順利進行，黨內同志也各有所思、甚至公開反對他，與他期望的「團結」差距很大，讓他頗感挫折。

⁸³ 砲戰末期來訪的杜勒斯在會談過後，私下向記者說他認為蔣介石是歷史上偉大人物之一，因為「他在面對重大挫折時仍保持信心、勇氣與決心——而如何面對挫折是對人的大考驗。」見 TOUSI 83 from Taipei, 1958.10.2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 19, MF (microfilm) 252。

斷的挫折中，之所以能夠持續積極奮鬥的心態，以「完成國民革命」自許的原因之一。以下以一個例子來說明蔣這種心理調適機制。

八二三砲戰時，中共於 1958 年 10 月 6 日宣布停火一週，國府當時宣稱自己獲得了「第一回合的勝利」，但砲戰的結果其實挑戰了蔣介石最重視的「反攻大陸」國策，而從蔣在日記中所記的心理與思惟轉折，可清楚看到他面對困境的心理調適過程。1958 年 10 月 23 日，蔣介石與來臺協商的杜勒斯發表了聯合公報，內中說反攻大陸的基礎是在大陸的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這樣的用詞是與美方協商的結果，英文版本譯為“the principle means of successfully achieving its mission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Dr. Sun Yat-sen’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the use of force.”⁸⁴ 仔細閱讀會發現兩者意思其實一樣，但英文的寫法因為使用了“not the use of force”，且與前面的“the principle means”中間隔著許多字，故留下可以斷章取義的空間。⁸⁵ 例如在公報剛發布、尚未見報時，雷震就在日記中寫下：「外面傳出臺灣放棄使用武力反攻大陸」；第二天看了公報全文後，雷震更是認定蔣介石被杜勒斯所迫，放棄武力反攻，「政府以阿 Q 方式，提出了『三民主義』作政治上之反攻，完全是遮羞之語。」⁸⁶ 另一方面，美國則全面宣傳國府已經放棄武力反攻，並要中共照辦，但這樣的解釋卻引起臺灣內部輿論與支持國府僑界的大力撻伐。⁸⁷ 這對不斷宣傳即將「反攻大陸」，且以反攻

⁸⁴ 公報中文原文見《中央日報》，民國 47 年 10 月 24 日，第 1 版。英文可見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011 (11.10, 1958), p. 721-722.

⁸⁵ 後世學者們對公報評價不一，但多數認為公報是國府放棄武力反攻的表示，例如臺灣學者栗國成指出，公報雖然讓臺灣「看似」喪失了軍事反攻的主動權，但讓其專心政經發展，創造了臺灣奇蹟，故他認為公報是美國成功的策略。栗國成，〈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期間臺、美、中之反應與互動〉，《國家發展研究》4: 1 (2004 年 12 月)，頁 151-206。港裔英籍學者曾銳生則認為：公報雖是蔣在杜勒斯壓迫下主要的讓步，公報宣稱不以武力反攻雖是他 1950 以來「真正的立場」，但公開說明顯示政策改變，宣傳用語也跟著改變，光復大陸成為政治與道德承諾，而非堅定的軍事意圖。見 Steve Tsang, *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K, 1950-1958* (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 2006), p. 98.

⁸⁶ 見雷震著、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 39 卷《雷震日記（1957-1958）》，1958.10.23、1958.10.24，頁 388。

⁸⁷ 此一事件美方的立場與宣傳，參見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6（2001 年 12 月），第四節「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國內與僑界媒體的批判，參見張淑雅，〈「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2010 年 12 月），頁 28-33。

為國策及存在意義的國府是很大的挑戰，對以反攻為職志的蔣介石個人更是相當大的逆境。

蔣介石日記對此一事件的記載，是他遭遇逆境時自我調適的很好例子。他在公報發表當天下午，只認為「憑藉」二字被「誤譯」為「使用」，故不太高興；但他怪自己太信任擔任翻譯的葉公超，沒有讓他做最後面譯，並告誡自己以後要小心。第二天早上醒來更覺譯文不妥，但自我安慰「萬事都互相效力，惟有使信神者得益」，相信結果將「於我有益」，亦即以天意來安慰自己。第三天之後，外界質疑放棄反攻聲浪不斷升高，他加重反省自己的「疏忽無主」，也有點懷疑葉公超翻譯時是否「有意」欺瞞。第四天，收到了杜勒斯、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對會談結果表示滿意的函電，蔣介石開始轉念到該如何具體運用美方「滿意之心情」。到了第五天，他想到公報也可能有正面作用：首先是華府可用來撫慰人民對反攻將美國捲入漩渦的恐懼，排除一些爭取軍援的障礙；其次，可以安撫其他自由國家，免得他們因擔心國府反攻導致大戰，反而積極去承認中共。第三，中共可能因此公報而鬆懈軍備，故有利反攻。最後，他在日記中承認當時無力執行軍事反攻，故公報並無實際損失：「我僅拘束於『武力反攻』而無法實踐之口號，徒使人民失望，究有何益？」而公報所得「乃登上實踐反攻之途，而放棄武力之虛名。」⁸⁸ 寫這話當天，他已經在日月潭泛舟、觀月、聽鐘，再過幾天他就完全放鬆而覺「幽閒自得」了。⁸⁹

若只看到最後「虛名」這段引文，可能會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決心與用意作負面的解釋。⁹⁰ 但其後的日記顯示，公報發表之後，他反而更積極思考與策劃透過金馬「跳板」之外的其他途徑去執行反攻的策略；⁹¹ 而公報發表後到 1960 年代中期之前，國府投入軍事反攻的資源與準備也比之前更多。⁹² 他自己在 1958

⁸⁸ 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0.22-26，以及本週與本月的反省錄。

⁸⁹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0.29。

⁹⁰ 當時批評者早就質疑國府老說要反攻，卻老不動手，只是打官腔，不見得有辦法，明明是「自欺欺人」，例見殷海光，〈社論：反攻大陸問題〉，《自由中國》17:3（1957年8月），頁6。而只看片段的日記，確實可能得到如陶涵所指稱的，即蔣明知反攻有生之年不會成功，卻不斷呼籲要反攻，以維持外省軍民的士氣，並作為統治臺灣的依據。見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pp.457-458；陶涵引用的是蔣 1952.08.08 的日記。

⁹¹ 蔣不斷思考新的反攻策略，首先是利用傘兵特種部隊引發大陸抗暴，接著想到在西南（滇緬邊境）建立「陸上反攻第一根據地」，例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1.27、1959.07.23。這就是第四節中所提到的「武漢計畫」，之後反攻大陸計畫還有許多不同的演變與名稱。

⁹² 國府軍事反攻計劃最大規模的是 1960 年代國防部「國光計劃室」所籌劃的各種大小規模計劃與演習。

年底的日記中記到：「一年半以後如能卸去總統職責，反得以革命軍領袖地位自動的領導反共軍民進行反攻復國的工作，再不受美國的干涉與限制，回復我自由行動矣！此乃自去年春季以來不斷考慮所得的結果。」⁹³ 這個感想是針對有關他1960年任滿是否要修憲以便連任之爭議而發，但類似的想法在日記內不斷重覆出現，顯示那段期間內，蔣介石認為領導反攻遠比繼續當總統更重要，當然不可能輕易就放棄反攻大陸。⁹⁴ 故對這些記載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在碰到重大問題或煩惱中會自己扭轉心念，儘量往正面思考，以便讓自己在「空前挫敗與恥辱重重之中」還能堅持下去。可以想像的是：若他一直沈浸於失敗的負面情緒之中，恐怕就很難提起精神繼續「奮鬥」、還堅持且深信「革命」必定成功。一般人若長期處於逆境與人生目標看來遙不可及的狀況下，又無法轉念，只怕不是放棄就是得憂鬱症、甚至發瘋。蔣介石日記中不乏類似的逆境轉念例子，提供了理解他「生存之道」的資訊，這應該是他長年靜坐靈修、努力練習新儒家修身之道，加上深刻宗教信仰作心理支持的結果。⁹⁵

六、蔣介石一瞥：代結語

蔣介石寫了將近 60 年的日記，筆者只閱讀了 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初日記的部分，故對他的觀察充其量只能算是「驚鴻一瞥」，既不完整，更無法對蔣作任何論定。但這樣的一瞥，還是看到了一些可以幫助理解這段期間蔣介石的身心狀況、生活習慣、思惟模式等較趨近一個完整的「人」的印象。對蔣介石個人而言，這段期間寫日記主要的作用似乎是行事備忘、抒發情緒、修身紀錄與協助

見彭大年編，《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1950-1981 年間反攻大陸軍事計劃的概要，可見國防部史編局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頁 1775-1811。

⁹³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12.27，「上星期反省錄」。

⁹⁴ 段瑞聰也指出，蔣在 1949 年下野之後仍繼續干涉軍政，是因為他認為「革命領袖」與總統職位無關，「尤其無總統職位，不有法律之限制」，這樣的想法還公開向美國記者宣示，顯示蔣革命領袖想法的一貫性。見段瑞聰，〈蔣介石的繼續革命論：第三期國民革命中心理論的形成〉，頁 3，引〈蔣介石日記〉，1949.06.11-12。

⁹⁵ 當然，這樣轉向正面思考的記載也可以解釋成蔣介石只是擅長於自我安慰，以便繼續沈浸在反攻的白日夢中，不去面對現實，這就牽涉到人如何面對逆境的心理分析，但日記內這樣的例子數見不鮮，才會作此「轉念」解釋。

思考。日記的詳細記載難免揭露他思惟過程中邏輯上的漏洞，有些地方含混不清或重覆累贅，甚至透露出他的無力與脆弱，以及決策受失敗記憶所左右的偏頗。日記中顯示的正面思考，雖有自我鼓勵的作用，但也可能被解釋為不願面對現實的自我欺騙。若蔣企圖以經年累月的日記來創造自己的「正面」形象，顯然不是那麼成功。筆者認為較貼近的解釋，是他在日記中跟自己對話，自我反省鼓勵，也藉著書寫來釐清自己的想法。多數人的草稿或日記可能都有前面所提到的漏洞缺點，或許正可顯示日記對他當下實際的用途似乎高於刻意創造歷史形象。

日記中顯示他生活與關懷的重點是軍事事務、黨務問題、冷戰局勢與宗教家庭；除了家庭外，其他都環繞著他自詡的使命——反攻大陸、完成國民革命。如他自己所說：「余今若不是為國家存亡與人民禍福，以實現主義為己任，則早可卸責隱退，為個人安樂與求全計，乃可說無此不得矣。」⁹⁶ 雖然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國府反攻大陸縱非不可能、成功機率也極低，但日記中大量記載有關反攻的各種思惟顯示，蔣介石非常執著於他自我設定的使命，不斷反覆思考如何突破各種層次的阻礙。雖然反攻最大的障礙應該是中共，但來自友方——黨內同志、國內反對派、僑社、自由世界，尤其是最大的「盟邦」美國——的障礙也不遑多讓，甚自他自己都可能是達到此目標的障礙。1959年元旦，他寫下「拿翁語錄：『使我失敗者是我自己而不是他人，我一生最大之敵人是我自己。』此言實得我心，誠為千古偉人皆應引為圭臬之格言也，戒之、勉之。」⁹⁷ 不沈浸在負面情緒的轉念工夫，則是支持他持續堅持完成革命的信念、屢敗屢戰的重大因素之一，而轉念的工夫可能來自宗教信仰與實踐儒家修身方法所致。

當然，將所有情勢都往正面、有利的方向思考，也可以解釋成不願面對現實，甚至導致錯估情勢並做出與自己目標相違的反應或政策。這或許是他到晚年都無法毅然決然執行他在臺時期最重視的「反攻大陸」政策的原因，長遠來看也導致臺灣的國家定位問題一直懸而未解。但如同他晚年所寫感想：

⁹⁶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5.08。這是針對外界批評「蔣氏父子」與「家天下」的「污蔑」而發——當然這也可以被解讀為故意在日記上製造自己的形象，但日記中類似的記載頗多。

⁹⁷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9.01.01。

處此亂世混局中，惟有自強不息，順應自然，才能生存，而免致煩惱憂傷。亦只有自強不息者，方能順應大自然之趨勢，知足常樂，知忍常安。有時候，除了順應自然外，無法勉強。環境越複雜，越險惡，越要有靜觀的態度和樂觀的精神，與對上帝仁愛的信心，滌除塵穢、消除煩惱憂愁，如此定能隨心所欲了。⁹⁸（底線為筆者所加）

蔣介石畢竟在持續不斷的逆境中生存下來了——對凡人而言，生存的排序多半優先於不惜代價去實踐理想，而蔣終究只是個凡人。

如前言所提，學者利用蔣介石日記所作的研究，已經把蔣還原成個有血有肉的凡人。不過，至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多半還是著重在釐清事件與臧否蔣重要決策的智愚對錯，較少對他作為一個「凡人」的整體描述。筆者期望這篇短文，對理解蔣介石凡人層面有些許幫助。日記顯示蔣介石雖然反觀自省與恆心毅力超過大多數的凡人，但他跟所有的凡人一樣關懷親人、不斷受身體病痛折磨、經常苦惱於理想與實際間的落差、危機時容易焦慮失眠與情緒失控等等。⁹⁹ 他的行動也常在激進與保守間擺盪，而逐日記載則清楚顯示他因應變化局勢的政策與心理調整。他對自己修養與脾氣的描述，顯示他經常掙扎於忍耐（理想）與爆發（實際）之間；反攻是他在臺時期念茲在茲的革命目標，國府也確實投入不少資源作軍事計劃與準備，但他對實際執行的思惟卻常擺盪於不顧一切獨立反攻（理想），¹⁰⁰ 與保守的「待時乘勢」以免小不忍則亂大謀（實際）之間。¹⁰¹ 他對與中共鬥爭性質的界定，也徘徊於冷戰（理想，允許國際干預）與內戰（實際，不牽入美國）之間。¹⁰² 由於蔣介石的想法與行動常常在兩極間擺盪，做法也會因應時勢而有所

⁹⁸ 此段想法寫於1967年10月之後，書寫處在〈歷年隨意手錄〉，這是寫在1961年日記本上的歷年雜記，此段書寫處在1961年8月17日處。

⁹⁹ 黃倩茹指出九一八事變的1931年，連續危機讓他情緒處於極端、常常失眠。見Grace C. Huang, "The Person and the Persona in the Diaries of Chiang Kai-shek," 發表於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2010年12月2-3日。多數人面對緊張局勢可能都會失眠，這也是日記顯示蔣的凡夫面向。

¹⁰⁰ 1959年初，蔣介石傾向不顧一切、獨立反攻，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9.01.04-12。

¹⁰¹ 蔣很服膺孟子公孫丑篇所說的：「雖有智能，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因此理智與實際思考時，會認為「戰備完成後必須待時乘勢方能事半功倍」，例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年之本年大事表，「反攻戰爭之準備計劃（十一月七日記於日月潭）」。

¹⁰² 八二三砲戰之前多界定為冷戰一環，以自由世界合作力量反共；之後，由於美國擔心捲入大戰輿論聲浪越來越大，乃逐漸轉向定義為內戰，希望舒緩美國人對介入內戰導致大戰的憂慮。

轉變，若以片段日記來解釋或論斷他的意圖與目標，可能難免會斷章取義，甚至倒果為因——而歷史研究的第一步，應該是辨明因果。

另外，日記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對蔣介石「獨裁」的理解。前文中提到，蔣自承大陸失敗原因之一是他的「獨裁武斷」，甚至無識自大而「坐井觀天」所致，並警惕自己要引以為戒。日記顯示他在臺時期對發布重大訊息時的兢兢業業，經過自己多方思考修改後的想法或文稿，往往在發出前還是會先召集幕僚來商討。日記中筆者閱讀過的重大案件記載，例如 1958 年的彈劾俞鴻鈞與出版法修正案、八二三砲戰的各種決策與宣傳概念、1960 年的雷震案，以及 1961 年的外蒙入會案等，在處理過程他都是很小心謹慎的一再與核心幕僚商議。他在日記中寫到：「今後無論理論文字或軍政計劃，必須先提交幕僚審議而後再作決定。凡心裡對於事物有所疑慮者，亦應如此，以彌補缺失或修正錯誤為要。而且此為已經獨裁自決以致失敗之最大教訓，應切戒之。」¹⁰³ 日記中也有他的想法被中常會或幕僚否決的紀錄，¹⁰⁴ 而處理雷震案過程中他呈現的焦慮，更顯示他無法專斷獨行。¹⁰⁵ 這些紀錄，讓蔣介石獨裁的定義或程度還頗有深入討論的餘地。

美國學者 R. Keith Schoppa 認為：公眾人物知道他的日記將會公開，所以可以決定日記要寫什麼，也能形塑自己想要流傳的歷史形象，故他警告在使用日記材料時，要分辨日記記載的究竟是真實觀點或者是製造出來的形象；他認為歷史要角的日記通常兩者兼具，使用者又該如何分辨？¹⁰⁶ 筆者以為，像蔣介石日記這樣長期書寫、幾乎從未間斷的日記，無論書寫的動機為何，¹⁰⁷ 都提供了理解蔣介石個人價值觀、生存之道、思惟脈絡轉折，以及他對必須處理事件輕重衡量

¹⁰³ 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9.03.28。

¹⁰⁴ 彈劾案中監察院黨部沒有經過黨部中央審核、沒向總裁報告就提出；出版法修正案提出前未徵求他的意見、提出時間也沒經過他同意等，都顯示他「獨裁」的限制。見胡佛檔案館藏，〈蔣介石日記〉，1958.01.16、1958.04.18。

¹⁰⁵ 蔣對雷震案起訴書不斷的親自修改校訂與商議，以及過程顯示的焦慮，可見 1960 年 9 月下旬的日記。

¹⁰⁶ 這是 Schoppa 對陶涵的 *The Generalissimo* 一書中使用日記的討論，見 R. Keith Schoppa, "Diaries as a Historical Source: Goldmines and/or Slippery Slopes,"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7: 1 (Spring 2010), pp. 31-36.

¹⁰⁷ 楊天石認為日記有寫給別人看的，往往裝腔作勢，把真實的自我包裹起來，但蔣介石的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故有較高的真實性。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頁 xvii；黃倩茹則認為蔣日記在 1933 年設立侍從室，開始編寫事略稿本之後，有較多製造歷史形象的意味，見 Grace C. Huang, "The Person and the Persona in the Diaries of Chiang Kai-shek."

的訊息。除了蔣介石主政時的各種政策與重大案件外，日記還提供了對於他個人生命、學習、信仰，以及「革命」理念的形成與轉變等相關資訊，也可擴及運用於討論蔣與其他近代中國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革命思想的比較，以及兩岸發展與中國現代化，甚至中西文化論爭與交融蛻變等議題。故除了以蔣介石為主題的研究者外，任何中國與臺灣近現代史的研究者也都會感激有這樣的史料。¹⁰⁸

十九世紀的美國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說：「假使能夠讀到仇敵的祕密歷史，我們就會發現，每個人生命的悲傷與痛苦，足以讓我們卸除所有的敵意。」¹⁰⁹ 此語筆者深有同感，因世間的敵意與衝突多半來自誤解，理解則有助於消除或降低衝突的機會，筆者以為這該是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以此，對史料的解釋最好盡量貼近歷史人物的想法與意圖，避免以研究者的思考模式與價值標準來論定或批判。這或許不同於一般認為研究者應該具備「批判性」眼光，不要被研究對象牽著鼻子走。但了解研究對象的思考行為模式，並非被牽著鼻子走，而是藉著體會歷史行動者的處境與內心世界，以對歷史進程的因果做更貼切的解釋，避免被研究者自己的主觀成見（或預設立場）牽著鼻子走。每個人都有自己思考行為的模式，理解後將事件行動的思惟納入行動者個人一貫的脈絡中，可能較貼進研究對象的想法，這對增進了解、減少衝突，應該較有幫助。

¹⁰⁸ 陶涵對 Schoppa 提醒使用日記風險的回應，任何傳記作家或歷史學家都會感激傳主或研究對象有 53 年日記做佐證，因為就算最會作態的日記作者，長期書寫也會透露其真正的感覺。見 Jay Taylor, “Response,”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7: 1 (Spring 2010), p. 49.

¹⁰⁹ 引自塔拉·布莱克（Tara Brach）著、江翰雯譯，《全然接受這樣的我》（臺北：橡樹林出版社，2006），頁 234。

引用書目

- 〈王叔銘將軍日記〉1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蔣介石日記〉(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藏。
-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011 (November 10, 1958): 721-722.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19, Chin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 馬若孟、林孝庭，〈揮別過去：遷臺初期的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1950-1952〉，下載日期：2009年11月30日，<http://www.hongfan.org.cn/file/upload/2008/12/12/1229501775>。
- 《中央日報》，民國47年10月24日，第1版。
- 《聯合報》，民國46年12月24日，第3版。
- Huang, Grace C. 黃倩茹
- 2010 “The Person and the Persona in the Diaries of Chiang Kai-shek.” 發表於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
- 山田辰雄
- 2010 〈日本における蔣介石研究の現段階〉，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學術研討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 王正華
- 2010 〈從蔣中正日記看1961年對美交涉〉，發表於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
- 王奇生
- 2009 〈蔣介石的閱讀史：以1920-1940年代蔣介石日記為中心的探討〉，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任育德
- 2009 〈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2: 221-262。
- 2010 〈蔣中正對國民黨的省思與改造，以1949至1952年為中心〉，發表於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主辦，「蔣中正研究學術論壇：遷臺初期的蔣中正，1949-1952」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 朱宗震
- 2009 〈讀蔣介石日記心態〉，《觀察與思考》2009(22): 56-57。
- 阮大仁
- 2010 〈由蔣中正日記去看葉公超大使去職之經緯：「侮辱政府」、「奸詐欺騙」、「賣國漢奸」三罪併發（一）-（四）〉，《傳記文學》96(6)-97(3)。
- 林美莉
- 2009 〈普普蔣介石，潮流與點滴〉，《中央研究院週報》1244: 4-6。

林婉平

- 2009 〈從 1958 年出版法修正案看國民黨「CC 系」對黨中央的挑戰與式微〉，《史匯》13: 1-30。
2010 〈蔣中正遷臺初期對國民黨派系問題的檢討與整頓：以 CC 系為中心〉，發表於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主辦，「蔣中正研究學術論壇：遷臺初期的蔣中正，1949-1952」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林桶法

- 2009 《1949 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段瑞聰

- 2010 〈蔣介石的繼續革命論：第三期國民革命中心理論的形成〉，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學術研討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1 〈蔣介石的第三期國民革命中心理論〉，《慶應義塾大學日吉紀要·中國研究》4，出版中。

栗國成

- 2004 〈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期間臺、美、中之反應與互動〉，《國家發展研究》4(1): 151-206。

格爾多夫 (Raymond L. Gartroff) (著)、鈕先鍾 (譯)

- 1957 《蘇俄軍事思想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臺北：軍事譯粹社。

殷海光

- 1957 〈社論：反攻大陸問題〉，《自由中國》17(3): 6。

高曼夫人 (撰)、王家楫 (編譯)

- 1960 《荒漠甘泉》。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涂成吉

- 2007 《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防部史編局 (編)

- 1987 《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張淑雅

- 2001 〈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6: 231-297。
2008 〈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僚屬與美軍〉，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上冊，頁 123-16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0 〈「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0: 1-49。

郭岱君

- 2009 〈柳暗く花明るきところに又一村：蔣介石日記と蔣介石研究〉，發表於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主辦，「蔣介石研究の課題と展望：資料と課題」研討會。東京：日本大學文理學部。
2010 〈蔣介石日記與蔣介石研究〉，發表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主辦，「蔣介石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陳永發

- 2008 〈評楊天石新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傳記文學》92(6): 113。

陳立文

- 2010 〈從蔣日記看蔣介石與《蘇俄在中國》〉，收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編，《蔣介石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41-250。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陳紅民

- 2010 〈1950 年代後期蔣介石應對突發性事件之研究（之一）：處理「彈劾俞鴻鈞案」〉，發表於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

陶涵（著）、林添貴（譯）

- 2010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下冊。臺北：時報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彭大年（編）

- 2005 《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無名的基督徒（An Unknown Christian）（著）、胡恩德（譯）

- 1950 《勝利生活的秘訣 *How to Live a Victorious Life*》，香港：宣道出版會。

覃怡輝

- 2009 《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塔拉·布萊克（Tara Brach）（著）、江翰雯（譯）

- 2006 《全然接受這樣的自我》。臺北：橡樹林出版社。

楊天石

- 2006 〈鬼？神？人？：解讀蔣介石日記〉，《文史博覽》2006(21): 30-33。

- 2008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

- 2010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

雷震（著）、傅正（主編）

- 1990 《雷震全集》，第 39 卷《雷震日記（1957-1958）》。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劉維開

- 2008 〈蔣中正對 1949 年失敗的檢討：以演講為中心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9: 85-125。

- 2009 《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臺北：時英出版社。

蔣介石

- 1958 《本黨又是面臨時代一次考驗》。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

- 1984(1958) 〈革命民主政黨的性質與黨員重新登記的意義：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對中央評議委員第一次會議之指示〉，收於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27 卷，頁 237-277。臺北：中央委員會黨史會

蔣經國

- 1991 〈危急存亡之秋〉，收於張良任總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頁 374-502。臺北：行政院新聞局。

賴啟（訪錄）

- 1994 《賴名湯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賴淙誠

- 2008 〈近代中國國家的型塑：領導人物與領導風格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21:

62-67。

龍應台

2009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臺北：天下雜誌出版社。

Bae, Kyoungghan

2009 “Chiang Kai-shek and Christianity: Religious Life Reflected from His Diary.”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1): 1-10.

Garthoff, Raymond L

1953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Lu, Fang-shang and Lin Hsiao-ting

2008 “Chiang Kai-shek's Diaries and Republican China: New Insight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5(2): 331-339.

Schoppa, R. Keith

2010 “Diaries as a Historical Source: Goldmines and/or Slippery Slopes.”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7(1): 31-36.

Tai, Paul H. and Tai-chun Kuo

2010 “Research Notes: Chiang Kai-shek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7(81): 81-86.

Taylor, Jay

2009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Response.”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7(1): 43-65.

Tsang, Steve

2006 *The Cold War's Odd Couple: the Unintende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K, 1950-1958*. 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

Wang, Qisheng

2009 “Chiang Kai-shek's Reading: an Inquiry Based on Chiang's Diary, 1920s-1940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3(1): 11-25.

A Glimpse of Chiang Kai-shek in the Late 1950s: Observations through His Diaries

Su-ya Chang

ABSTRACT

Utilizing the newly released Chiang Kai-shek Diaries of the late 1950s, this article analyzes Chiang's living habits and explains how he used the diaries as an outlet for his temper, frustration and anxieties, and also as thinking pads. It then explores the focuses of his attention to understand his major concerns as the supreme leader of Taiwan. From the thinking and decision-making patterns as revealed in the diaries, the article further explains how Chiang survived his continuous failure and remained positive in the seeming impossibility of recovering the Mainland. It is hoped that the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can shed more light on this key figure of Taiwan's postwar development, and go beyond the previous dichotomy between excessive exaltation of Chiang as the national liberator and undue condemnation of him as a heartless dictator. It is my wish that historians can aptly regard him as no more than flesh and blood, and thus interpret his thinking and policies from a perspective in greater resemblance of his original motivation. After all, as an active historical player, he does deserve a say in the history about/around him.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Diaries, Return to the Mainland,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elf-examination, Religious Practice